

想问题,审美文化问题,生态和环境美学问题,文艺与意识形态问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商品化或商品的美学品格问题等,这些座谈或笔谈不仅推动美学大踏步地走向现实,回应了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而且给人们上了美学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一课,增进了人们对美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解与信心。

但是,美学首先是一种本体论,即存在论。美学不能在回应其他经验学科和现实需求的过程中迷失自身。因为正像杜夫海纳说的,审美处在人的“根

源”的底部,如果说人是劳动的产物,那么美就是劳动的一种品格;如果说人是文化的内化,那么美就是文化的一种特性;如果说人是理性的动物,那么美就是理性的表征;如果说人是会使用符号的动物,那么美就是最原始的符号。美学既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果,也是它的最后根据。美学的价值固然在于它的现实的功利主义诉求,但是,这种诉求只能在美学自身的问题获得解决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确立和确认。

坚守理念,开阔视野,引领文潮,这是我们对《文艺研究》三十年的描述,也是对它的期望。

新学科的支持者与承载者

乐黛云

1983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钱钟书先生在会上说:“我们不但开创了纪录而且也平凡地、不铺张地创造了历史”。他指出,在欧美文学界大谈“宇宙末日论”之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所共有的,却是一种兴奋的‘开始感’”。他并预言这样的会将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广,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理想(钱钟书《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杨周翰、乐黛云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两年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在巴黎召开,法国比较文学元勋,当年七十五岁高龄的艾田伯(Rene Etiemble)教授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为题,作了退休前最后一次总结报告。他说:“倘若我们的比较文学界不满怀诚意、竭尽全力地效法中国的榜样,我们就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取‘死亡’意思的已结束的世界!”(艾田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孟华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89年第1期)加之1985年由全国三十八所大学和研究所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中国比较文学一时在全国蓬勃铺展开来。

然而,尽管在“圈子”里如此热闹,这个新学科却并未受到学术媒体足够的重视,报刊杂志报道者寥寥无几。惟有《文艺研究》一马当先,在1983年第4期上,就集中发表了钱钟书先生的《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杨周翰先生的《寓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杨宪益先生的《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伽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还有张隆溪先生的《诗无达诂》。这些论著无论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还是比较诗学等方面,都应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奠基之作。接着,1985年发表了刘纲纪的《中西美学比较方法论的几个问题》。90年代初期又接连刊登了周来祥、彭修良的《中西美学范畴的逻辑发展》、肖鹰的《论中西美学的差异》、徐宏力的《自我论与“真我观”——中西审美主体意识管窥》、杨坤绪的《中西美学融汇的启端——王国维融汇中西美学思想的考察》等多篇开风气之先的文章。此后,直到90年代中期,《文艺研究》一直是讨论比较美学和比较艺术学的重镇。1996年,北京大学王宇根的《诠释循环对于中西比较诗学的意义》发表,1997年又发表了余虹的《中西诗学

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和张海明的《走向比较诗学》,1999 年发表了童庆炳的《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自此,比较诗学成了《文艺研究》理论部分的重要内容。

刚进入 21 世纪,《文艺研究》就发表了著名诗论家和诗人郑敏的带有指导性和号召性的重要文章《中国文学应当关注世界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当时郑敏教授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她的这篇文章在文学研究界很有影响。后来《文艺研究》接连发表的杨慧林的《当代神学对文论研究的潜在价值》、王岳川的《“发现东方”与中西“互体互用”》、蒋述卓、周兴杰的《佛经传译中的跨文化交流模式》等论文都堪称中国比较文学的担纲之作。值得一提的是 2005 年,《文艺研究》开设了“比较文学与文论”专栏,这在众多文学期刊中,可称绝无仅有。该专栏刊载了乐黛云、王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专论,起到了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正本清源的作用。其他文章,如詹杭伦的《刘若愚及其比较诗学体系》、王文生的《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与艾略特的“无个性文学”》、普慧的《佛典汉译及汉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吴相洲的《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的再探讨》、陈忻的《儒学对唐宋诗歌与日本和歌抒情性的影响》等也都显示了比较文学学科的重大发展及其所达到的新的水平。2006 年,《文艺研究》又开辟了新的文学人类学跨学科文学研究的

专题平台,发表了叶舒宪的《“猪龙”与“熊龙”——中国维纳斯与龙之原型艺术人类学通观》和彭兆荣的《“第四世界”的文化遗产: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野》等。这些文章都是有着明显的前沿性与独创性的重要论著。2007 年《文艺研究》在重要位置发表了乐黛云的《文学:面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的重任》,这篇文章提出,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时空巨变,这种巨变要求人类根本改变过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铸造新的精神世界,建造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财富无限聚敛的可持续的文明。这一任务将文学提升为维护多元文化共生的新人文精神的重要承载者,使文学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转型。2008 年又发表了夏中义的《论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以 1948 年为转折点》和薛雯的《邓以蛰与克罗齐比较论——关于直觉、境遇、历史等概念的说明与运用》等深入而很有创意的文章。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文艺研究》自创刊三十年来,一直是跨文化、跨学科(包括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支持者和承载者。当“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要感受它、认识它,看到它的发展前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远见卓识,还要能持之以恒,始终如一。《文艺研究》的主编和工作团队正是如此,他们的高瞻远瞩贯穿了已经过去的三十年,我们有理由期待它更辉煌的未来。

祝贺与感谢

邵大箴

《文艺研究》是我的老朋友,我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三十年来,它是一本我爱阅读的杂志,我从这本杂志上获得不少知识,了解了不少有用的信息,也在它上面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得到不少帮助,对它一直怀有亲切的感情,这是其一;我和在《文艺研究》杂志社工作的一些编辑,由于工作上的来往与彼此文艺观念的交流,建立了

亲近的友谊,这是其二。再往深处说,近三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和《文艺研究》杂志一起接受了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和由这一大潮激发的新观念、新思想的滋润,经受了文艺界风风雨雨的锻炼,逐渐对文艺发展规律和原理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当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感觉到《文艺研究》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共同分享文艺理论研究取得的丰硕成